

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

3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混不下去的人，默默地离开了，坚持下来的人，还在憧憬着一切都会好起来。聚居村里的人就这样生活着……

郑章军，男，1982年生，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人。父母都是工人，有一个亲弟弟。北京科技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四在北大青鸟软件培训班学习一年，现供职于国企，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2002年的夏天，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EMS到了林西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小城里。从县到乡，再从乡到村，村长亲自敲着锣，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郑章军的家门口。他们村，之前只在1986年、2000年出过两个大学生，到郑章军，是第三个，要开学进京了，父亲和他打了一包衣服，坐在采矿的拖拉机上来到了县城。他们没有坐在驾驶室里，只是坐在矿石上，随着拖拉机一颠一颠地上下起伏，扑腾颠簸。从县城辗转来到火车站，站台上，父亲只说了五个字：好好学习噢。

18块的半价火车票，就把他从内蒙古赤峰载到了偌大的北京城。

其实，郑章军的父亲对读书看得不那么重要，而是把钱看得挺重，倒是他的母亲上了十几年学，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是很少见的。初三的时候，父亲指着一辆拖车对他说：儿子啊，以后就你开车，我拉矿石，咱爷儿俩这样多好，嘿嘿！可是，郑章军就觉得，应该要走出去，到北京。

2006年7月，走出北科大门，郑章军拦了辆出租车，把一箱书一箱衣服搬上去，来到了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知道这里，只是因为离学校很近。一个起步价，就远离了他四年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步入社会的第一站。

屋子是早就看好的，六个人的包间，每人半年1350块，就可以在这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寻得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大部分的空间，还有两张桌子，可以放些日常书籍和电脑。行李都被堆在靠墙的一角，剩下的就斜躺在下铺的空地上，需

要从箱子里拿东西的时候就直接拖出来。这些，都还是大学宿舍的光景。

不过，这里晚上不熄灯，一起合住的也不是同班同学，还多了很多蟑螂。

郑章军说，刚搬来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就听见砰砰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对面屋的女生，她一个人住害怕，因为老看见蟑螂在眼前爬来爬去，刚好这个寝室里还有个空着的床位，这个女生就“留宿”了一个晚上，顾不上上面住着五个大男人。

还是那个夏天，他下铺的人有一天早上醒来，觉得鼻子堵得慌，结果竟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杀蟑除害。

周末，他们起了大早，关上所有窗户，大喷特喷刚买的杀虫剂，确保每个隐秘的角落都没有放过，才关上门，出去打篮球吃饭洗澡。等到下午回来，低头一看，“满地都是蟑螂的尸体，一两百只恐怕都不止”。郑章军说，从亿展公寓再往里走，有的房间条件更差，就像“贫民窟”一样，没有地砖，墙也没有好好粉刷过，水泥地，摇摇晃晃的上下铺，一个床位也就100多一个月。

“我不大想住在这里，因为接触的人有时让我很不舒服。”郑章军解释，很多住在这里的人，没有工作或者赚钱很少，整天窝在房间里打游戏。有钱没钱尽管不能全作为评判的标准，但是，“有了钱，生活至少会有点品质吧”。

郑章军每月工资5000，在这里也算“有钱人”了，还住在二里庄，只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搬出去。

郑章军如今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做软件工程师，找到这个工作是在2006年10月份，7月份他刚毕业就失业，整整三个月都在不停地找工作，如果是别人早就忙乱不堪了，而他，从小就有发泄压力的独家秘方——打篮球。

工作稳定下来之后，郑章军经常

在网上找些“私单”，自己干，可以额外获得不少收入。这些活儿，有时候要占用他周末休息的时间。甚至有一年生日，为了在期限之前把私活儿干完，他取消了和同学聚餐，通宵编程。那天，从下午两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终于干完了，匆匆吃了点早就叫好的外卖，他就倒头睡去，一直到黄昏再次降临的时候才醒来。

小月河的周末，总在九点以后才从睡梦中苏醒，辛苦了一周的“蚁族”都利用难得的休假，睡个懒觉，但在大学时就习惯了早起的郑章军会有负罪感。“屋里静悄悄，一睁眼发现八点多了，很愧疚。”

谈到大学里那些动辄正午才起床的同学，他略有轻蔑地说：“现在还在睡觉呢——因为没找到工作。”周末除了打球、干私活，郑章军还要抽出时间来陪女朋友。

他们认识已经半年多了。他说，这个女孩儿说她不爱逛街，长得也挺可爱的，于是就开始了。“谁知之后就爱逛街，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他女朋友自己承认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郑章军心里咯噔了一下，“七八十岁的老头，也有房，你直接嫁了算了！”“那太老了，不合适。”女朋友没有听出话里的怒气，还有些娇嗔地回着。

郑章军说，以后就算有了钱也不会拿来为结婚而买房子，资金买了房子，“就是死的”，有了一定的资金，最好还是开自己的软件公司，这样可以“钱生钱，干一番事业”。

高中时，郑章军看了一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他害怕不知不觉中自己就变得一无所有，立即草拟了一张计划表，督促自己不断努力。在白纸上，他写了长长的一串：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他再回想起来，“真

是一份宏大的计划”，当时虽然不切实际，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现在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显然已经深思熟虑，有了现实的考量。近期的目标是年底之前开个小饭店。开始的资金、租用的门面，他都准备好了，就差老家的亲戚过来帮忙经营。开饭店，主要是为了让内蒙古农村里的亲人们能在北京落脚扎根，“这样他们既有事情做，也可以挣点钱”。

他还计划在五年之内，有自己的软件公司。“我有技术，又肯吃苦，肯定没有问题。”在公司里，同事们遇到难题，都会放下，但是他会“一直记在心里，不停地琢磨”，或者在网上的论坛和朋友们一起讨论，最终肯定都能解决。从不放过任何问题的他，在积累了软件研发经验的同时，也越来越自信。“软件公司，不需要太多的硬件设备，只要有技术，不愁接单子。”在公司里做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积累经验，积累客户。“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单干啦！”

他打算开公司的时候，搬到条件好点的地方。每月一千多租金的房子比较适合，既可以更舒适地生活，也可以作为办公的场所。“接触的人群，素质也会高一些，”他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做好手边的每件事，不能浪费时间。”

二里庄小月河的公寓，经常弥漫着让他不能忍受的香烟味儿，还有从大学里带出来的懒散。他在大学时也有那样的室友——正午以后起床，吃了午饭，溜达一圈儿，心情好了就去上课，到了晚上回寝室打游戏，通宵不睡，早上起不来，正午以后才起床……就这样循环着。小月河里的房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就住在这里，拿家里的钱“虚度光阴”。

时间对于郑章军来说，却无比珍贵。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除了不懈地努力，还需要时间。

禁书总是诱惑难挡

1

畅销读物

《灰皮书、黄皮书》

第一次接触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作品是我还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这些在当时绝对是禁书，幸好我每年暑假都从台湾回香港，有机会找到这种书偷偷带到机场，小心翼翼上了飞机带回台湾，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里面瞧。当时看这些书觉得太新鲜了，因为它被批判，我反而觉得它讲得都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老百姓就越觉得它讲的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禁止它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导出另一个阅读状态的问题。下面介绍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叫《灰皮书、黄皮书》，作者沈展云，以前曾经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报纸开过专栏。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就是灰皮书、黄皮书。什么叫灰皮书、黄皮书呢？“皮书”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殊的产物，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书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翻译，到了文革中段的时候甚至闹过书荒，但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出版物，叫“皮书”，是一种内部参考发行的书。

皮书通常是一些政府认为老百姓不能看也不该看的书，认为这些书是“毒草”，之所以还要出是为了给大家学习批判。比如跟苏联闹翻的时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要批判你得先组织大家学习一下修正主义是什么，于是内部就出版一些关于修正主义的书籍，包括一些外国翻译回来的书，让大家好好学习研究，学着怎么干掉他们。这种书就叫皮书，一般来讲，黄皮书是文学作品，灰皮书是政治书。

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的诱惑有多

大可想而知，很多人要凭证才能买这种书，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混一张这样的证。这种书一旦卖出去它的命运就不由当局掌控了，它就可能民间市场四处流传，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了。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越是被禁大家越相信，所以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沈展云发现有论者认为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的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但是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得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到底什么叫读书状态？我们平常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念书呢？在高压社会下，有某种书你不能碰，就像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一样。这时候，环境反而逼着你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个果实真的能给你智慧，真的能开你的眼目，即使它不是那么出色，你也觉得它很了不起，这就是处境所造成的特殊阅读结果。

另一种特别的处境就是坐牢，尤其是坐政治狱。政治犯在监狱里如果能够读书，他们会读什么书？我读过很多人的狱中笔记，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和人物传记。读史是想掌握某种历史规律，希望能够指导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能够出狱，如何宏图再起。而读人物传记则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励自己的士气。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

都起到了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是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一个人在失意落败甚至坐牢的时候如果读人物传记，想励志，他的视野和心胸就很容易变得狭窄，或许最后他会觉得自己志气远大，那是因为在读这种书的情况下读励志书只会越读越觉得自己原来是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就死命一条，一门心思往一个角落钻过去，而绝不会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的。

《查令十字路84号》

要在世界上找一个最适合逛书店的城市，伦敦绝对排在名单的前三位。如果要去伦敦逛书店，你多半会去查令十字路，因为这条路上新、旧书店到处都是，各有特色，跟我们日常看到的书店不一样。在查令十字路你会看到一些很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就是喜欢某本书，即便50年没人买，还是要把它放在架上。

查令十字路有一家酒吧在84号，酒吧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就是当年有名的查令十字路84号书店的原址。

为什么原来那家书店那么有名？像莎士比亚书店一样了不起了吗？它之所以有名全靠一本书《查令十字路84号》，作者是海莲·汉芙，她在美国只能算二流作家，一生大半时间都在编写历史教材、教科书或是帮美国电视及好莱坞写剧本等。写的东西不算怎样，人也比较穷苦潦倒，就因为出版了这本书，她的名字被永远记下来，也因为这本书，这家原来不算特别的书店被永远记住了。

这本书其实是本书信集，里面是身在纽约的海莲·汉芙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跟查令十字路84号这家小书店之间的书信往来。之所以

会有书信往来是因为她跟他们订书。本来纽约有很多书店，但是海莲·汉芙深深爱上了英国文学，觉得美国文化很低级，甚至觉得自己干的电视行当也很低级。海莲·汉芙一直很崇拜英国，认为只有在英国才能买到好书，她痛恨当时纽约那些书店，觉得它们非常庸俗无聊，所以她从这家书店买书，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书信往来。

现在这些书信集集成一本小书，还被拍成了电影，皆因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刚开始通信的时候，英国处在战后，物资紧张，采取分配制度，每家每年分到的鸡蛋、火腿、罐头都有限，不是你没钱，就是有钱你也买不起。海莲·汉芙很同情这家书店店员的处境，常常给他们寄罐头，寄鸡蛋，有时甚至通过邮政服务从欧洲别的地方寄过去给他们。这家书店的人收到这些罐头、鸡蛋、火腿之类的都吓傻了，说：“好久没见过肉了，为什么一个顾客会对我们那么好呢？”海莲·汉芙说：“你们卖书给我，难道对我不是比我对你们还要慷慨，还要了不起嘛，对不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的爱书人互相通信。起初她通信的对象是这家书店的经理，叫弗兰克·德尔，后来变成了弗兰克·德尔的老婆、他的孩子、书店的老板，最后甚至书店的邻居也都加入到这个通信里，变成一段因书而起的奇妙缘分。最特别的是，作者一生从未踏进过这家书店，没能看看这个书店和跟她通信的人。这本通信集有喜悦，有微笑，充满文学跟书的爱以及一些漂亮的记载和思考，同时也带着淡淡的忧伤。

海莲·汉芙虽然是二流的作者，但绝对是一流的爱书人。她说“我从来不买没有读过的书”，换言之，买的书一定是读过的，那还买来干吗？她形容说：“否则不就和买了一件没试穿过的衣服同样的下场吗？”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梁文道通过自己读书后的消化、反刍，然后变成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起了一个图书“中介人”的作用，把社会思潮、文化热点等内容以另一套大众化语言进行推广。

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书评性质的书，而是近似于一种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从中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